



范玉书 著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范玉书，河北香河人，197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北省直团委书记，河北省直党校常务副校长，河北省直工委副书记，河北省企业工委副书记，河北省国资委副主任，河北省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监事会主席，河北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正厅）；现为河北省政协委员、省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会会长，河北省企业（行业）文联副主席。多年来从事党务工作，曾主编《生命线之歌》、《十六大以来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探索与实践》、《创新探索与实践等书》。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 / 范玉书编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202-07612-5

I. ①学… II. ①范…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 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581号

书 名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
编 著 范玉书

责任编辑 解京宁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张珊珊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天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42 000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7612-5/D · 71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经走过了90年的艰苦而光辉的历程，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段论述高度浓缩了中国共产党90年来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发展，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富裕而奋斗的历史和取得的辉煌业绩。

中国共产党90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概括起来，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多年文化历史

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90多年党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活生生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定不移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13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2周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在此之际，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认真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更加自觉地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认识能力，坚定信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为此，将我平时学习党史知识笔记归纳整理，编写成《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一书。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笔记，主要摘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三大部分各个历史阶段的进程和发生的重大事件。下篇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常识学习笔记”，本篇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摘记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基本知识，共92题；二是摘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92件经济建设的大事；三是摘记了中国共产党党史有关知识。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共产主义小组与党史上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的制定及修正简况”等。最后附录本人《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学习党史心得体会》，说明学党史的重要作用。本书本着精编史料、简明扼要的原则，力求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易学、易懂、易

记、易通。愿此书能成为广大党务工作者学习研究党史的参考，并作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学习党史的入门教材，使之牢固树立“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和同志们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省委党史研究室胡庆胜主任、宋学民副主任、杜丽荣处长和王小平同志对文稿作了修改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省委宣传部崔文武处长、河北人民出版社谢京宁总编及有关编辑认真审稿和精心编辑；省国资委党建处和省国企党建研究会肖跃进、石军民、乔仕成、张家浩、王亮等同志付出了大量的文稿整理和校对等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范玉书

2012年12月

目 录

上 篇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笔记

第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至1949年10月）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辛亥革命 2
-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革命纲领的制定 2
 - 1.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
 -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3
 - 3.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4
- 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6
 - 1. 北伐战争的胜利 6
 - 2. 大革命的失败 7
- 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8
 - 1.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8
 - 2. 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10
 - 3.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14
 - 4. 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18

5.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21
五、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24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24
2.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24
3.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26
4. 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28
5.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 取得最后胜利	31
六、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34
1. 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34
2.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 斗争	35
3.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36
4. 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38
5.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的召开	39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至1976年10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41
1. 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和巩固	41
2. 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恢复	43
3.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46

4.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48
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51
1. 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51
2.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54
3.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56
4.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 “左”的错误的发展	60
5.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63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66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66
2.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68
3. 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70
4.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73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6年10月至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历史的伟大转折	75
1. 平反冤假错案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75
2.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77
3. 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78
4. 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81
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3
1. 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83

2.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85
3. 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86
4. 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	88
三、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90
1. 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	90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	92
3. “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93
4. 党的十五大和跨世纪发展战略	94
5.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96
四、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99
1. 党的十六大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99
2.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101
3.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102
4. 党的十七大和新的考验	103
5. “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108
6. 党的十八大和继往开来	109

下 篇

一、中国共产党基本常识92题	112
1. 五四爱国运动	112
2. 党的早期组织	112
3.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2

4. 党的第一部章程	112
5.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113
6. 第一次国共合作	113
7. 五卅运动	113
8. 南昌起义	113
9. 八七会议	113
10. 秋收起义	113
11.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4
12. 广州起义	114
13. 井冈山会师	114
14. 古田会议	114
1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14
16. 九一八事变	114
17. 红军长征	115
18. 长征精神	115
19. 遵义会议	115
20. 一·二九运动	116
21. 瓦窑堡会议	116
22. 西安事变	116
23. 卢沟桥事变	116
24. 第二次国共合作	116
25. 大生产运动	117

26. 延安精神	117
27. 百团大战	117
28. 延安整风运动	117
29. 毛泽东思想	117
30.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118
31. 重庆谈判	118
32. 全面内战爆发	118
33. 辽沈战役	118
34. 淮海战役	118
35. 平津战役	119
36.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19
37. “两个务必”	119
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19
3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19
40. 开国大典	120
41. 土地改革运动	120
42. 抗美援朝战争	120
43. “三反”运动	120
44. “五反”运动	120
4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20
46. 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21
47.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21

4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21
49. 过渡时期总路线	121
50.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121
51. 第一个五年计划	122
52. 《论十大关系》	122
53. 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	122
5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22
55. 雷锋精神	122
56. 焦裕禄精神	123
57. 大寨精神	123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23
59. 大庆精神	123
60. “两弹一星”	123
61. 王杰精神	124
62. “文化大革命”	124
63. 中、美关系正常化	124
64. 粉碎“四人帮”	124
6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24
66.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25
67. 创建经济特区	125
68. 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125
69.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26

70. 社会主义的本质	126
71. 邓小平理论	126
72. 香港回归	127
73. 抗洪精神	127
74. 澳门回归	127
75.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27
7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27
77.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成功进入太空	128
78. 战胜“非典”疫情	128
79.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128
8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8
8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28
82. 取消农业税	129
83.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129
84. “八个方面良好风气”	129
85. 科学发展观	129
86. 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	130
87. 抗震救灾精神	130
88.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130
89. 成功举办上海世界博览会	130
90. “十二五”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130
91. 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	131

92.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31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济建设92件大事	131
1.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	131
2.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32
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32
4. 八七会议	133
5. 井冈山《土地法》制定	133
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133
7.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发表	134
8. 《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颁布	134
9.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	134
10.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经济政策	135
11. “利用外资”思想提出	135
12. 战时财政经济纲领	135
13. 精兵简政	136
14. 边区货币政策	136
15. 新战时财政经济政策	136
16.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表	136
17. 抗战时期经济政策	136
18.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37
19.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发表	137
20. 减租运动	137

21.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	138
22. 《论联合政府》发表	138
23. 土地改革与工业化	138
24.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发表	138
25. 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139
26. 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139
27. 《关于工商业政策》发表	139
28. 西柏坡财政统一	140
29. 引私人资本入轨	140
30. 中央银行成立	140
31. 七届二中全会	140
32. 企业国有化	141
33. 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化	141
34. 农业合作化	141
35.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	141
36. “三反”运动	142
37. 第一个五年计划	142
38. 公私合营	143
39. 反思苏联经济模式	143
40. 八大明确国家中心任务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43
41. “三面红旗”提出	143
42. 庐山会议	144

43. 全面调整经济政策	144
44. 学习大庆和大寨	144
45. “两弹一星”	145
46. 三线建设	145
47. 文化大革命	145
48. “两步走”重大设想提出	146
4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46
50. 改革开放	146
51. 国企扩权和自立	147
52. 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147
53. 经济体制抉择	147
54. 股份经济新芽	148
55. 双轨制价格改革	148
56. 银行体系改革	148
57. 利改税	148
58. 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49
59. 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149
60. 价格闯关	149
61. 资本市场的发展	150
62. 邓小平南巡谈话	150
6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50
64. 金融监管体系发展	150

65. 分税制改革	151
66. 可持续发展战略	151
67. 扶贫开发	151
68. 住房改革	152
69. 三峡工程	152
70. 十四届五中全会	152
71. 外汇体制改革	153
72. “一国两制”和港澳台问题	153
73. 以多种形式实现公有制	153
74. 亚洲金融危机	154
75. 三年脱困	154
76. 西部大开发	154
77.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55
78. 两个“毫不动摇”提出	155
79. 新农合	155
80. 文化体制改革	155
81.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156
82. 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	156
83. 振兴东北	156
84. 党的十七大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157
85. 两个“36条”	157
86. 废止农业税	157

87. 创新型国家战略	157
88. 奥运会和世博会	158
89.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158
90. “十二五”规划纲要通过	158
91. “三公”经费公开	159
92. 事业单位改革	159
三、中国共产党党史有关知识	160
1.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160
2.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60
3.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第一”	165
4.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的制定及修正简况（一大至十八大）	179
5.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194
6. 中共中央历任主要负责人	196
附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 ——学习党史心得体会	198



上 篇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笔记

上 篇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笔记

中国共产党党史按历史进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第二部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第三部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

第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至1949年10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已走过90多年的历程。在这90多年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史上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波澜壮阔的。这场伟大的革命，为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辛亥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革命纲领的制定

1.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

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

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达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斯基列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

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3.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

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1. 北伐战争的胜利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

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

2. 大革命的失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

“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千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2. 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

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3.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

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做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

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

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

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4. 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

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

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5.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

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会议。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五、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等协议。

2.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

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3.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

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

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4. 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欧洲许多国家，1941年6月又挥兵东向，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共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以及派遣武工队等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敌后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

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九月、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

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5.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期，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准。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

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

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六、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1. 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

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是以国共两党协商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个文件的签订是人民力量的胜利。国民党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

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38名代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反对内战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上，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常常事先协商，采取联合行动。

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党一方面真心诚意地希望实现国内和平，准备认真履行协议和为实现协议而奋斗，同时也指出，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练兵、减租和生产三项中心工作。

2.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占沈阳，进攻四平，到1946年5月占领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党领导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挫败了国民党集团独占东北的狂妄计划。

1946年10月，国民党在其军队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中旬强行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出席。随后，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国共关系调停。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全部撤退。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大门完全被国民党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大量出卖中国权益，进一步投靠当时拥有世界头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美国也企图向世界扩张，把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因而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来华等。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宪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

3.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据此，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

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万学生掀起“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斗争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

大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全国兴起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4. 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人民群众在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万余辆。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是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南京的次日，攻克太原。5月，先后解放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上旬解放浙江全省（除舟山群岛外）。8月，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和平解放。9月，在攻克西宁、银川之际，新疆省和平解放。九、十月间，解放军在衡（阳）宝（庆）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然后向广东、广西进军。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为赢得这场战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以董存瑞、刘胡兰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5.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人民政协的召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2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

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至1976年10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1. 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和巩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随着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到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进入城市后党的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新解放区工矿企业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恢复生产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党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恢复生产而奋斗。

国家财经状况的初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

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八个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与我进行停战谈判。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

2. 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在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

从1950年冬季起，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约有35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党中央决定分别不同情况，用更长的时间，采取适合各少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措施来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在西藏地区，中央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的同时，应广大农奴和进步上层人士的要求，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

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

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

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1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判处死刑。

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中央决定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通过这次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

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4.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两个决议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合作社已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9月，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样，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大大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此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两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定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注意对生产和流通的许多环节统筹安排，纠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现的紊乱现象，从而避免了通常情况下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

留了一些问题。但就50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 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及中国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

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2.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新社会矛盾突出起来。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處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

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3.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试图在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反映了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立起

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接踵而至的胜利使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

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

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4.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

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议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

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等省，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推荐了湖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的社教也由“五反”改为“四清”。这次会议虽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这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5.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

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

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选出

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越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2.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作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

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3. 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

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趁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

“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

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60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接触“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

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4.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悼念周恩来。

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撤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痼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

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6年10月至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历史的伟大转折

1. 平反冤假错案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随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全文转载，各省报也予以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

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2.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出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听任这两个方面的倾向发展下去，必

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各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从部队到地方，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3. 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虽引起一些人议论纷纷，却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

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

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4. 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它的主要点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这是第一次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

的初步概括。《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党在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党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9年1月，党中央宣布对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获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国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

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中央还纠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落实了党的政策。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求，各级纪委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作为根本任务。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对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同年11月召开的中纪委座谈会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进一步引起全党对党的建设的重视。

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

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

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2.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

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

3. 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

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4. 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

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三、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1. 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 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

十四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上发生偏差，同时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

从1992年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一再提醒全党，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1993年3月，党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借和经济过热问题。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

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3. “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起草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中国政府排除各种阻力，有条不紊地进行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大随后起草并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结束了长期隔绝局面，两

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数“台独”势力的分裂企图不断受到有力打击。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了变化。党中央继续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和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中国共产党将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坚决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图谋，为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

4. 党的十五大和跨世纪发展战略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于极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的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

大会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

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9年，党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针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组织全国各界开展对“两国论”的批判；二是针对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行径，开展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5.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决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

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一总目标，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根据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党中央对这次“三讲”教育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进行精心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认真总结经验，检查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推动“三讲”教育扎实、有序地开展，并分别到7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全党共有70万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中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达2100多人。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三讲”教育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广大干部在“三讲”教育中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显提高，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中思想上、作风上的收获，不断转化成广大干部求真务实

实、锐意进取、廉洁自律、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实际行动。许多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花这么大力量，在领导干部中进行这样认真的自我教育，显示了共产党人敢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气魄。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在2000年春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深刻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全党进行认真学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进一步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力措施，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四、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1. 党的十六大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席大会代表2114人，代表全党66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报告还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问题。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同志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党的

“十六大”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将其列为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它的内涵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决定还规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六个重要原则和五大任务。由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战略任务，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

抗击“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系统疾病。2002年11月，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2003年2月中下旬，疫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4月中下旬，波及到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疫情不仅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领导全国人民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全面部署防治工作。4月24日，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总指挥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指挥部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方面一道，按照“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全力以赴开展防治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考察调研，慰问医护、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指导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2.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200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命题，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围绕党必须履行的执政使命，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来加强党的建设，目标是“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在全党7000万名党员中，分三批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基础工程。

3.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取得许多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在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表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进一步深入阐述。

4. 党的十七大和新的考验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2217人，代表全国7300万党员。胡锦涛在会上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报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报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报告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并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共十七届一中会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大会科学地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因此，党的十七大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2008年3月开始试点，2008年9月正式启动，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到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从各批次、各领域和各类党员群体实际出发，

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批次衔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化理论学习，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打牢思想基础；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夯实组织基础；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广泛吸收群众参与，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巩固群众基础。二是紧密联系各项工作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凝聚科学发展力量；紧贴群众愿望和期待，着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使学习实践活动成为群众满意工程。三是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集中整改，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努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历时一年半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地震，涉及中国10个省、区、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共造成6.9万多人遇难，37.4万多人受伤，1.8万多人失踪，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0多亿元。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组织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活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入现役部队总兵力达13万之众，涉及20余个专业兵种，规模之大，专业之全，创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灾历史纪录。我国第一次决定接受国际社会救援力量的支援，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民众、各地政府，迅速汇成抗震救灾的洪流。国务院决定，2008年5

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为尽快恢复灾后重建工作，19个省市确定分别对口援助18个四川受灾县市和甘肃、陕西两省受灾严重地区。6月8日，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至当年9月底，抗震救灾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中国举国抗灾、众志成城的精神以及政府高效有力的救援，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同时，第13届残奥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保障。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李宁点燃了设在国家体育场的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台。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期间，有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在28个大项、38个分项比赛中，争夺302块金牌。各国运动员创造了骄人的运动成绩，共打破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纪录。中国体育代表团顽强拼搏，取得了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首位，实现了我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在9月6日至17日的第13届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89枚金牌、70枚银牌、52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次贷危机”逐渐演变和扩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纺织行业、汽车行业、船舶行业表现低迷，尤其是进出口行业受冲击最为严重。对此，从2008年6月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并形成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称之为“一揽子计划”。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以扩大内需；二是大范围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涉及十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准备在两年内加快推进科技专项规划，投入1000亿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后劲；四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提出“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当务之急是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拉动经济。11月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并为此计划投资约4万亿元。此外，相关部门还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降息并取消利息税、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商品出口退税率、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等等。这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在2008年历史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

“神舟七号”发射成功。自1992年中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以来，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首访太空，2003年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首飞太空，2005年费俊龙、聂海胜乘“神舟六号”携手问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短短几年间连续取得重大突破。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许，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三艘载人飞船“神舟七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搭载的3名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开始了中国第三次载人航天之旅，首次实现中国宇航员的太空漫步：9月27日16时41分00秒，航天员翟志刚身穿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走出飞船并顺利完成预定的空间科学实验操作。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的一小步，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向前

迈出的一大步，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出舱活动的国家。除出舱外，中国航天员还首次在外太空进行空间科学试验，并在轨释放一颗小卫星。9月28日17时37分，在太空遨游两天多的“神舟七号”在顺利完成空间出舱活动和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后，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上。“神舟七号”飞天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飞天的千年梦想。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直接领导下实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涉及众多科技领域的宏大系统工程，包括航天员、空间应用、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和空间实验室八大系统，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汇聚了全国数千个单位。16年来，党中央、全国各相关单位和部门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努力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佳组合。参加工程研制、建设、试验的10多万名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目标一致，决心一致，步调一致。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具体部署下，中华民族在太空中一次次唱响众志成城的时代最强音。

上海世博会。2002年12月4日，经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元人民币，吸引了2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参加，为历届世博会之最。上海世博会会场面积5.28平方公里，单日入园参观人数最多达103万人，参观人数总计达7300多万人次，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的最大规模纪录。到10月31日，持续6个月、共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圆满结束。无论是参展方数量、参观人次还是单日入园人数，上海世界

博览会均刷新了历届世界博览会159年来的历史纪录。本届世界博览会还安排了2万多场次的文化演艺活动，平均每天演出100场，创历史之最。这场被誉为“成功、精彩、难忘”的世界性盛会，不仅传播了“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世博理念，也是一场世界文明的大展示。

5. “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创先争优”，即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创先争优”活动，是在基层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并富有成效的一种活动形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关于党的建设的部署中明确提出开展两项活动，一是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二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要“普遍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化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创活动，坚持和完善‘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为推动“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201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组部、中宣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组部、中宣部召开会议对创先争优活动进行部署。随后，创先争优活动在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广泛开展起来。2010年4月，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始终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统筹抓好各领域各行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的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随着创先争优活动的广泛开展，2011年3月，胡锦涛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坚持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深入一线，深入实际，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需要，是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需要。

6. 党的十八大和继往开来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鲜明地向党内、国内外宣示：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对于我们党团结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十分紧要。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2268名，特邀代表57名，代表着全党8260多万名党员。胡锦涛在大会上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高度评价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报告。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认为，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描绘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为了推进党的领导层新老交替，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一批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表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表现了对党和国家未来充满信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八大是一次高举旗帜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团结奋进的大会。



下 篇

中国共产党基本常识

下 篇

一、中国共产党基本常识92题

1. 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爆发的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2. 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3.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3人，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 党的第一部章程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5.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

潮，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

6. 第一次国共合作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7. 五卅运动

以上海工人为主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8.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9.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10. 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1.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2.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

13.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14.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会议初步解决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以及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任主席。

16. 九一八事变

也称柳条湖事件。1931年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动的武装进攻沈阳的严重事件。九一八事变后的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17.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18. 长征精神

1996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高度概括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一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二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四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9.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20.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北平学联组织的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21.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

会议。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22. 西安事变

也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留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被迫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23. 卢沟桥事变

又称七七事变，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策划的一个严重事件。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

24. 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25. 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生产运动。

26. 延安精神

2002年4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时，高度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内涵：坚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7. 百团大战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破袭作战。这次战役持续3个半月，八路军参战部队有105个团20余万人，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发动的规模最大、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28. 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9. 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30.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31.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32.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33. 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发起辽沈战役。这次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

34.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淮海战役。这次战役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

35. 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发起平津战役。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次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36.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新中国的蓝图。

37. “两个务必”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3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40.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41. 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42. 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正义战争。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

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国内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43.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44. “五反”运动

1952年1月至10月，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4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46. 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有明确规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法律化、制度化的第一步。

4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由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49. 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0.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51.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到1957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等主持制定，“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52.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53. 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

5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5. 雷锋精神

雷锋，1940年出生，湖南省望城县人，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战士。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任务时不幸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在题词中对雷锋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56. 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1922年出生，山东淄博人，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1964年5月被肝癌夺去生命。1967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57. 大寨精神

1964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周恩来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第2758号决议。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59. 大庆精神

1964年，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90年，江泽民高度概括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

60. “两弹一星”

新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代表成果。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61. 王杰精神

王杰，1942年出生，山东金乡县人，济南军区驻江苏徐州某部战士。1965年7月在一次训练中为掩护民兵而英勇牺牲。王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在生前的豪迈誓言：“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王杰及“两不怕”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62.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63. 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64. 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6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66.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67. 创建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68. 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适时地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69.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党的十三大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70. 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71. 邓小平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

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施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被党的十五大确定写入党章并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72. 香港回归

1984年12月中、英双方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香港回归祖国。

73. 抗洪精神

1998年夏，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展现出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

74. 澳门回归

1987年1月，中、葡两国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在澳门举行交接仪式，澳门回归祖国。

75.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批准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7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重要思想被党的十六大确定写入党章并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77.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成功进入太空

2003年10月5日，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成功进入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78. 战胜“非典”疫情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防治“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的胜利，提高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发展前景的信心。

79.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其中指出，先进性教育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分三批进行。这次活动，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

8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2005年2月，胡锦涛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8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82. 取消农业税

自2006年1月1日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我国存在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83.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建成并实现全线通车试运营。青藏铁路的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84. “八个方面良好风气”

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十六届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一是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二是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三是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四是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五是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六是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七是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八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85. 科学发展观

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被党的十七大确定写入党章，被党的十八大确定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86. 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

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正式启动，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学习实践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

87. 抗震救灾精神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迅速展开了一场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惧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

88.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至24日，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口号的第29

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50枚金牌，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

89. 成功举办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90. “十二五”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91. 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

总体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主要内容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求是“五个好”：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五带头”：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

92.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以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文化建设与发展。全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深刻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与经验，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动员令。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济建设92件大事

1.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

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1925年9月21日，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勾结军阀，武装包围工人俱乐部，至此，工人消费合作社被迫“关门”。

合作社最早实施营业员聘用制。为筹措所需资金，合作社发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的股票，第一张红色股票诞生。消费合作社印发的股票、铜元票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和对股份制最初的尝试。

2.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925年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五一劳动节上午，两个大会偕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士，举行了十万人以上的大示威游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

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同志用32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

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个报告还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4. 八七会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确定了以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5. 井冈山《土地法》制定

1928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区域标准；山林分配法；土地税之征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

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一半；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初创时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20万大洋（购买力折合现今人民币约600万~700万元），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7.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发表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举办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作为制定当时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根据。决定中提到：工业方面，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商业方面，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不实行“对外贸易垄断”，但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财政与税则，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则；市政方面，改良贫苦人民的居住条件等。

8. 《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颁布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条例主要阐述了合作社的性质、作用和组织方式。合作社系由工农劳动群众集资组织，种类有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

种，富农、资本家及其他剥削者，均无权参加；合作社社员不仅兼股东，且是该社的直接消费者、生产者、借贷者。

9.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

1934年1月24日至2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以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策，并阐述了对不同性质经济的地位和对待原则，提出了适当发展私有经济。

10.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经济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自由。

11. “利用外资”思想提出

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欢迎外资的，但是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他提出如何吸收利用外国和华侨资金的方式，明确指出吸收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1944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提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12. 战时财政经济纲领

1937年8月25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

纲发布，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两大纲领是：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13. 精兵简政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

14. 边区货币政策

193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等，指导边区金融建设。

15. 新战时财政经济政策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政策内容涉及有计划地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等。

16.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表

1940年1月15日，延安发表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文章提

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17. 抗战时期经济政策

1940年12月25日，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关于土地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

18.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遵照“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带领下，分三路浩浩荡荡开进了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荒地南泥湾，进行大生产运动。

19.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发表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12月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阐述了重要的经济思想，如经济决定财政；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和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股份经济，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等观点。

20. 减租运动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

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年内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年内彻底减租。同时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

21.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

1944年8月31日就《解放日报》社论草稿，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

22. 《论联合政府》发表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土地问题上，“耕者有其地”。在工商业问题上，主张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方式组成，对国计民生的企业由政府主办，私有资本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鼓励存在，还涉及工业发展和金融建设等其他事情。

23. 土地改革与工业化

194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要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经济建设方针。

24.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发表

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一文中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1946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25. 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于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本法公布前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农民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

26. 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明确概括为：“没收封建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中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27. 《关于工商业政策》发表

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指出：应当将消灭地主

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28. 西柏坡财政统一

1947年春，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好转，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扩大，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日益增强，但由于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造成贸易上的重大障碍。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迅速调整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9月8日西柏坡会议上关于财政统一问题指出：以华北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

29. 引私人资本入轨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指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要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他解释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30. 中央银行成立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

31.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

32. 企业国有化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企业共2858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到1949年底，没收的官僚资本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单位，拥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在金融业方面，没收了庞大的银行系统及各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官办银行2400多家。官僚资本的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等交通运输企业，也陆续转移到人民政府手中。

33. 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化

针对新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全国财政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

34. 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

35.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

1952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干部配备方案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地方计委，全国性计划管理机构初步建立。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纱布和食油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36.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根据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之后，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开展起来，至1952年10月25日宣告结束。

37. 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全面恢复。为了尽快且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开始实施从1953年至1957年的旨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援助的156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项目，建立社会主义工业的初步基础；按照从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有步骤地推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持宏观经济各部门的账户平衡，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8. 公私合营

1953年，毛泽东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后，确定了公私合营这种有利于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稳妥办法，这一办法在1954年被开始有重点和有计划地推广。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39. 反思苏联经济模式

1956年，苏共二十大尖锐批判斯大林，揭露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提出警示。中国需要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十大关系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者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40. 八大明确国家中心任务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八大明确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国家的中心任务需要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41. “三面红旗”提出

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赶英超美、全民大炼钢铁、粮食卫星上天”为标志的“大跃进”和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起构成所谓“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既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历史现象，也是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反面教材，整个国家在一味地追求速度，而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漠不关心，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大伤元气。

42. 庐山会议

1958年底，中央发现“三面红旗”造成的一些问题，开始纠偏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倾向，压缩工农业生产指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开始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计划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

但在7月23日后，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激烈纠“左”的势头表示不满，会议主题急转而下，会后决定在全党范围内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后开始了新的“大跃进”并再度刮起“共产风”。

43. 全面调整经济政策

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开始反省“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盲目性。经过1960年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形成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44. 学习大庆和大寨

1960年5月开始的大庆石油勘探开采大会战，从全国调集了4万多人和7万多吨机器设备，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建成了能够使国家从根本上摆脱油荒的大庆油田。大庆成了工业战线上的典型，而农业战线的典型是陈永贵带领下的山西省大寨村。

45. “两弹一星”

1960年第一枚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颗氢弹的相继成功爆炸和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国防科技的发展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提高了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主动性，进而为争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46. 三线建设

1964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加上中苏关系和台湾海峡关系几度紧张，中国北部和东南方向面临开战风险。毛泽东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新疆、东北和沿海各省市，三线指中西部的11个省及自治区。中共中央决定以战备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三线建设，由此揭开了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工业内迁的序幕。

47. 文化大革命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好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左”的思潮一直阴霾不散。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系统化和明确化，随后被付诸实践。在经济上大搞“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搞“四清”和“五反”运动，在文化上搞大批特批，在意识形态上搞“反修

防修”和坚决打击资产阶级苗头，在应对国际问题上大搞备战。

1966年，“左”倾势头终于突破在平衡中的纠缠而大规模爆发出来，《五一六通知》要求在全党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48. “两步走”重大设想提出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并在1956年把这一任务写入党章。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4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秋，安徽和四川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安徽省委决定向农民借地度荒，包产下去，谁种谁收。凤阳县的小岗村共20户人家决定实行包产到户，打下粮食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结果该村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3万斤。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广泛发展。

50. 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尽快把农业搞上去，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51. 国企扩权和自立

1978年10月，四川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拉开了旨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改革序幕。7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一系列相关办法后，扩权改革在全国各行各业迅速推开。扩权的主要内容是，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和一定的生产计划、供销、资金运用、人事管理等生产经营管理权力。

52. 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1979年，中央决定在毗邻港澳台的深圳、珠海、厦门和侨乡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后改称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政府划出的开展灵活多样的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享有特殊对外经济管理权的特定区域。特区内，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办厂、兴建合资企业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外资引进，鼓励发展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等有利于出口创汇的多种形式出口贸易。经济特区的成功举办成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对外开放从此持续地刺激着这个国家蓬勃发展。

53. 经济体制抉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引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

54. 股份经济新芽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试行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公司。1986年7月，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金融企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把股份制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继续试行，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

55. 双轨制价格改革

价格双轨制是在1979年价格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发生的。1981年，国家开始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主销售部分产品，销售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仍然按照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1984年《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的文件明确：计划内的产品实行国家核定的价格，计划外的产品则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1985年大规模放开农业副产品价格，“双轨制”的价格体系基本建立。

56. 银行体系改革

1979年1月，农业银行成立，3月中国银行成立，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中分离并在1983年5月成为专业银行，1983年9月成立工商银行；198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二元化银行体系形成。

57. 利改税

利改税是改革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核心内容是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

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是国家参与国有企业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种改革。1983年6月1日起国家在总结利改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分两步进行推广：第一步，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税利并存；第二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58. 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大会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还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59. 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规定写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在与国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既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60. 价格闯关

1988年中央政治局提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进行“价格闯关”。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但是1988年7月物价已经上涨19.3%，价格改革的

公布更引起抢购挤兑风潮。因此政府紧急叫停“闯关”，实行全面的经济“治理整顿”。

61. 资本市场的发展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成立，证券市场进入场内交易和集中交易阶段；国债的发行开始采用市场化的承购包销的方式；1992年10月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

62. 邓小平南巡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6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1992年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64. 金融监管体系发展

1985年至1992年，人民银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工作的重心是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1994年我国先后颁布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监管法规，1995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监管法律。1997年至2003年3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中国证券、保险、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证券业务相继脱钩，一行三会的监督体系正式形成。

65. 分税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分税制在1994年拉开了序幕，搭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省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66. 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时任国家总理的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3月《中国21世纪议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议程》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标志中国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67. 扶贫开发

198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8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规模扶贫攻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贫困标准也逐渐升高。

68. 住房改革

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1998年7月，国务院宣布下半年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调整住房投资结构；收入差异化的住房供应政策；发放住房补贴。

69. 三峡工程

经过长达40年的论证和近两年的施工准备，1994年12月14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承担了整个三峡工程85%的移民。2002年11月6日，导流明渠截流，至此三峡工程全线截流。2006年5月20日，185米大坝封顶，三峡大坝全线建成。

70. 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71. 外汇体制改革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之后，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等改革举措陆续施行。

72. “一国两制”和港澳台问题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统一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同日邓小平指出：“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根据台湾的意志来决定。”这是“一国两制”的最初萌芽。1984年，邓小平又先后提出了有关“一国两制”的许多重要论述，充实了思想。1985年3月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73. 以多种形式实现公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不断深化。1993年召开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1997年9月举行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74.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袭击亚洲，迅速蔓延。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原则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我国开始实施一揽子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措施。首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其次，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再次，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贷款规模管理，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和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

75. 三年脱困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三年脱困”的目标，即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三年内，使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基本脱困。中央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围绕实现脱困目标，一方面要扶优扶强，通过壮大优势企业带动困难企业摆脱困境；另一方面要把各方面的脱困政策集中，优先用于重点脱困企业和重点调整行业。

76. 西部大开发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

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主要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区市。整个西部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1999年末人口约占全国的2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75%左右。

77.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0日，经过中国15年的艰苦努力，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78. 两个“毫不动摇”提出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提到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79. 新农合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截至2010年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2678个，新农合人口达8.35亿，参合率达95%左右。

80. 文化体制改革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产

业概念及分类改革的要求，相应提出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任务，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后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在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革、调整结构布局等方面推进，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81.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完善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这让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一切私有财产所有者安心发展，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82. 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2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实现海外上市。

83. 振兴东北

党的十六大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若干意见》，就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作出系统部署，制定专门政策。2003年12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温家宝任组长。2007年8月，《东北

地区振兴规划》正式发布。

84. 党的十七大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确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大会提出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85. 两个“36条”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即“民间投资36条”。

86. 废止农业税

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与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负1350亿元。

87. 创新型国家战略

创新型国家是指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

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

88. 奥运会和世博会

2008年8月8日至24日，北京奥运会即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刷新了38项世界纪录和85项奥运会纪录，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奥运会金牌和奖牌零的突破。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市举行，参展方和参观规模都刷新了世博会历史纪录。奥运会和世博会的胜利举办，显示了中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国力以及和平发展的良好形象，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空间。

89.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并迅速向全球蔓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及时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极为困难、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实施正确有力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回升向好，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90. “十二五”规划纲要通过

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11年3月1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对于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91. “三公”经费公开

所谓“三公”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随着政务公开工作的推进，以及公开政府部门“三公”经费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因为某些因素，“三公”经费公开在程度、内容与方式上还有着不少问题。2011年被认为是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破冰之年。201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在决算中首次披露中央本级2010年“三公”经费支出。

92. 事业单位改革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下发。我国据此对现行事业单位进行清理规范，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国家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

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三、中国共产党党史有关知识

1.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2.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

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

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

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

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3.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第一”

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介绍的人

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它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文传入中国的人

陈望道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把这一著作全文传入中国的人。他是浙江义乌县人，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6月回国后，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师，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20年6月，他参加了陈独秀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于1919年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3人，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总共只有50多名党员。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历

史意义的大事，它标志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说：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确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实际上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并与此进行着斗争。但是80年来，从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明确地提出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中共二大的主要历史功绩就是，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第一次实现国共合作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势力篡夺后，国民党在几经挫折后组织涣散，成分混杂，思想混乱，于是，孙中山同意改组国民党，想吸收共产党作为救活国民党的新血液。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

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有了国共合作才促使全民族的大团结，才使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第一个反贪文件

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当时，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应当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但一些投机分子乘大革命之机“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他们混入党内后，继而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此党中央发出这个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通告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腐化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到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夭折，血雨腥风代替了生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但是，面对反动派穷凶极恶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并没有

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最初目的是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命令起义部队第一、第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一次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来纪念

一年一度的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的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举行，党的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日呢？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不久，6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7月1日到7月7日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中共中央也于6月24日发表了《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这一文献。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在纪念周每天都有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各抗日根据地所办的报刊也都发表了社论和纪念文章。

第一次纪念“七一”党的生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组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是在1938年6、7月间。当时是将7月1日至7月7日定为“纪念周”，把纪念党的十七周年生日同纪念七七全国抗战一周年结合在一起进行。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6月15日第三版上的《延安各界筹备举行纪念周》一文，记载了当时纪念活动的各项安排。

第一届干部学习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新形势也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党中央为了“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

性”，认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全党“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因此，在1940年3月24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在此期间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1940年5月5日，是第一届“五五干部学习节”，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40年4月16日“边区新闻”栏目里刊登消息：“纪念第一届干部学习节——延安在职干部举行学习总检查。”6月11日，该报又报道了中央宣传部召开学习运动总结大会的特讯，并公布了评选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各“学习模范小组”。

第一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十几人在北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以《新青年》社为中心，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前后创办的一些进步社团，如毛泽东等1918年4月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1920年1月20日在天津创办的天津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1920年2月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1920年秋在济南组织的励新学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天安门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

贼”等口号。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6月3日、4日，又逮捕800多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持续两天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率先行动，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继参加到罢工行列。很快在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五四运动形成了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中国重镇上海，工人阶级成了运动的主力军。

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那是在1920年1月。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5月，毛泽东与陈独秀，蔡和森与毛泽东、陈独秀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沈宏庐、杨明斋、李达等人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据回忆，当时不叫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当时的名称为“共产党”，或“共产党临时中央”）。不久，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各地成立的党组织也不叫共产主义小组，而称“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采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主要是根据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小组”和“地方小组”的提法，故后来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第一个宣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于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该宣言是为全国建党提出的纲领性文件。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理想和目的，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宣言，它曾作为当时收纳党员的标准，起过临时党纲的作用。

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早期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等20多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向全国各地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指导各地进行建团工作。

第一个公开性机关刊物——《新青年》

《新青年》月刊，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而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革命产生巨大影响。1919年以后，大量刊登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1926年7月最后停刊，前后共出63期。

第一个秘密性机关刊物——《共产党》

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即后来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创办了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6开本,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5000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6期,李达任主编。

《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竖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以大量篇幅刊载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对各地建党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1920年8月,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十余个地区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92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举行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1925年1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第一个纲领

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三、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第一个决议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包括关于工人的组

织、宣传，开办工人学校，工会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6个部分。

第一个农民协会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注重农民运动。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这是中共关于农民运动最早的历史文献。它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翻身解放。1921年9月27日，共产党人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发表农民协会章程和宣言。这是中共创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两三个月内，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的八十多个村庄，农协领导农民进行抗税减租斗争，取得很大的胜利。萧山农民运动也是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很快因遭到封建势力和反动军警的镇压而失败，但为后来大规模农运提供了经验。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为争取和团结全国各工人团体，使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下联合起来，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根据党的决定，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这次大会。5月1日至6日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5月1日，大会全体代表还与广州市5万多工人，一起举行了纪念五一示威大游行。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3个月内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斗争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等。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派军队对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保存工人实力，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铁路总工会忍痛宣布复工。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第一个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中共二大决定停办《共产党》月刊，另办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以指导国民革命。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半公开发行。第六期起迁到北京出版，以后又先后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开始发行几千份，最多时达到十万份。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首次公开阐明党所领导的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最早向群众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在宣传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第一个最大的农民运动

1923年，由共产党员彭湃等人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农民运动。海丰、陆丰、归善

三县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为后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章程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该章程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并总结了党成立一年来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而制定的。分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共6章29条。党章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依据，是党的建设的法规，第一个党章的制定，对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党中央组织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组织法规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大会选出，“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由9人组成，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5人组成中央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等等。组织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建设逐步健全。

第一个出版机关

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在出版社的书刊上故意印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字样。该社印行了《共产党宣言》等十多种马列主义丛书和其他革命书籍，对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该社与《新青年》合并。

第一个向全党部署工作的通告

1921年11月，为了具体贯彻实施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全党全面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要求近期必须完成的发展党的组织等4项工作。这是一大召开后，中共中央第一个向全党部署各项具体工作计划的通告，对党当时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

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周刊内容设有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诗歌、小说、读者投稿等专栏。文章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以生动的事例揭露了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觉悟，共出版了24册，1921年1月终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也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音》周刊。

第一个工会组织

在五四罢工浪潮以后，成立工会成了时髦，但大半都是有名无实的招牌工会，被政客、流氓、工头所把持。工人迫切需要冲破种种困难，组织起“真正的工人团体”。1920年1月21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了，这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12月又建立起了上海印刷工会。

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

1922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

表的政治声明。明确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解决中国混乱政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提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鲜明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对象和联合战线的方式，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了准备。

第一个妇女工作的决议

1922年7月23日，在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中央决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当时中国妇女的基本状况，提出中国妇女的奋斗方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应努力为了保护妇女及童工劳动的经济利益而奋斗，除此之外，还应为妇女的政治利益而奋斗。《决议案》指出了奋斗的主要内容。为贯彻此决议，中共二大决定设立中央妇女部。

第一个关于组织联合战线的中央决议案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战线（即后来称之为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并通过了关于组织联合战线的第一个中央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探索与国民党建立合作的方式问题。

4.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的制定及修正简况（一大至十八大）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十八大先后制定、修正过十八次党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一大党纲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也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纲领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C·M·维尔巴编的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二大党章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大修正党章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共六章，三十条。它和二大通过的党章相比较，基本是二大党章原来的结构的内容，只是个别条文的改动。如在关于党员入党手续方面，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党章还分别规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四大修正党章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从四大开始对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改称为“书记”。

五大修正党章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专门讨论

修改党章的问题，在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决议案共有十二章，八十五条，对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作出了远较前四个党章详尽系统的规定。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在我们党的根本法规上，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同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并规定“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修正章程在“党的中央机关”一章中，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总书记外，还要选举“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体现了加强集体领导的精神。

六大党章

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条。六大党章基本保持了五大党章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一些调整。六大党章较以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

七大党章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七大党章共有十一章七十条。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党章发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每一个党员“一切活动的准则”。总纲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的斗争经验，以简洁的文字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二，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三，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第四，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

八大党章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针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

情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此外，八大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如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增加了要积极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规、法令的状况；明确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等。八大党章还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

九大党章

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方针。九大党章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纲领，在党章中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总纲里充满了个人崇拜的错误。特别是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这在党章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接班人的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

十大党章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只作了个别

的修改和补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十一大党章

1977年8月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它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譬如：在总纲及有关条款中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党要认真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等等。但是，由于十一大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十一大党章没能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十二大党章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党章吸取了历届党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在七大、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写成的，也是吸取了九大、十大党章的教训并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而写成的。十二大党章的重要特点是：第一，有一个比八大党章更为充实完整的总纲，总纲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

定。对毛泽东思想，新党章在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作了比七大更科学的表述。第二，新党章对全体党员、党的干部提出比过去历次党章更加严格的要求。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求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第三，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比较具体的规定。而且吸取了历史教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第四，新党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还要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第五，对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也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另外，十二大新党章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

十三大修正党章

1987年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对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的内容作了修正。修改部分涉及到十二大党章的十个条款，即第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条。

十四大党章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有十章，五十条。新党章是对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进一步修

正，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我们党开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前进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写入党章，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新党章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新要求。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议，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鉴此，党章删去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十五大修正党章

1997年9月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次修改党章集中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总纲在原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之后，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

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修正后的党章对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规定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十六大修正党章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次党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坚持了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在保持党章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十六大对党章作了几项重要修改，第一、党章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二、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三、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第四、总纲中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增加了新内容。第五、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第六、对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第七、对党的基层组织的有关规定作了补充和修改。第八、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和任务作了补充规定。第九、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表述。第十、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

十七大修正党章

2007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要求全党同志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这个重大论断写入党章，对于动员全党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大会认为，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

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重大认识和成果。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对于全党同志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大会认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党在领导军队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形成的方针政策写入党章，有利于全面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切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大会认为，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认识和成果。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大会认为，在党章中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需要，是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需要。同时，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要求进行充实十分必要。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治党管党水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十八大修正党章

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大会认为，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同志更加深入地学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完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大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奋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大会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会同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这些内容写入党章，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对全党同志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会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把这方面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大会认为，十七大以来，随着党的建设实践发展，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正视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重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根据实践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要求。适应新的形势，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切实做到求真务实，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大会同意把这些新成果、新认识、新要求充实到党章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中，使党的建设的主线、总体布局、总体目标更加完善，有利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大会认为，总结吸收近年来党的建设成功经验，并与总纲部分的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作适当修改十分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广大党员应尽的义务；积极创先争优，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选拔干部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党要更加重视监督干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同志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增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利于更好坚持公道正派的用人作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力，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有利于推动干部队伍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各方面素质，更好发挥表率作用。

大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党同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好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

章，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5.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纲领》和《章程》都对党员的言行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并在以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党章不断进行了修改，从而对党员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红军时代，入党誓词已经比较规范，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几经修改。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把入党誓词作为一条写进了党章。把入党誓词写进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都重申了这一条。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共分为五个时期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6. 中共中央历任主要负责人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

（注：1931年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附录：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 ——学习党史心得体会

最近，我通过整理学党史笔记，又一次重温党史，心潮澎湃。忘不了革命前辈在硝烟中前仆后继，忘不了无数英雄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不顾身；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悲怆，让人难忘。今天的成就，今天的伟业，让人自豪，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

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虽然，在我们党发展史上，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生过曲折和教训，但是党很快进行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变得更加成熟，永葆党的先进性，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党史中的成功经验——党的建设经验、武装斗争经验、执政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等，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一代一代学习、传承，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重温党90余年的光辉历程，使我们深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进一步了解了党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今后的征程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范玉书

2012年11月

责任编辑：解京宁

美术编辑：吴书平

封面设计：张珊珊

学 知 跟
党 党 党
史 情 走

ISBN 978-7-202-07589-0



9 787202 075890 >

定价：48.00元